

黎鸣 / 著



西方哲学死了

中国工人出版社

西方哲学死了

黎 鸣/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死了/黎鸣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08-3141-2

I. 西... II. 黎...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550 号

出 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岳建一
策 划	博爱天使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1.75 印张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

序

自序

说西方哲学死了,这不是诅咒,也不是仅仅表达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属于真正历史的和逻辑的客观理性的判断。

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种说法,他认为在人类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几乎同时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如巴勒斯坦、希腊、波斯、中国、印度,出现了可称之为人类精神领袖的不同类人物——先知、哲人、圣人、佛陀等。笔者进一步认为,正是在这一个时期,人类同时产生了神学(古希伯来)、哲学(古希腊)和人学(古中国)。无论神学、哲学、人学,它们一并都是人类从不同侧面反思人性精神的学问,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死亡的标志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



西方哲学死了

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的原始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两层裹尸布包装着,并以此两种面目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古希伯来人的原始神学又如何呢?耶稣之死(公元三十年)象征着原始神学的第一次死亡;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犹太教的神学经过了一次再生,变成了伪人学的基督教的神学;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中世纪后期,由阿奎那出面使神学又一次再生,变成了伪哲学的经院哲学或经院神学;再经过新教改革运动,伪哲学的神学也终于走到了垂死的尽头。

古希腊人的原始(自然)哲学又如何呢?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社会帮助产生了哲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城邦民主社会完结了,自然哲学的时代也跟着完结了;从希腊化时代到古罗马帝国,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学人的手中,原始的哲学变成了伪人学的道德哲学;到了西方中世纪时代,经院派哲学其实是打着哲学招牌的伪神学;直到16世纪由笛卡儿创生了西方近代新的(自然)哲学的时代。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的叙述,既表明了笔者本人的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的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的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



自

序

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时代。与中国古代人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它们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发生了时间性的历史演变。这种合流的历史演变的结果,就像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变迁,不仅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在它们的交配和互补中产生了全人类历史的大质变,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交和起始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均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等,其中尤其必须提到笛卡儿,他被人们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启开了对人性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学,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民主)的大发明和大创造的时代,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方面,只具有孤立的原始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与西方人相抗衡的,仅仅靠单一的原始人学以及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中国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近现代人类理性的工具——科学与民主。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神学(但不缺乏迷信),更缺乏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又自行死亡了呢?这正是本书要加以回答的问题。

宣布西方哲学的死亡,是为了迎接全人类新的人学的到来而清出思想的平台。为此,在新的世纪,人类将首先进行一场新的人学的思维逻辑的革命,以多元论的逻辑取代哲学的陈旧的二元论逻辑,用全面的兼容的思维取代片面的偏颇的思维,其宗旨是在于全人类普遍的福祉,而决不是仅仅任何特殊人类的特殊的福祉。



西方哲学死了

20世纪是一个特别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经历的苦难达到了人类历史之最:最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最多的人类相残、最恶劣的人性尊严的侮辱、最无耻的道德沦丧、最肆无忌惮的生态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与哲学的兴盛与死亡密切相关,而这一切又全都带进了新的21世纪。

二

在二十一世纪尚未到来之前,我便已经撰写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恶兆》一文^①,此恶兆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超越联合国,擅自狂轰滥炸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致使死伤平民数以万计,毁坏财产数以亿计。此举还曾被赋予一个高尚的口实,即:“人权高于主权”。但是,由谁来定义人权,并且由谁来裁判人权,仅由美国或北约吗?强权取代公理,一至于此,人道、正义,乃至真正的人权究竟何在?在此文之前,我曾发表了《西方哲学死了》一文^②。之后又发表了《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一文^③想不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也即2001年9月11日,世界又接着爆发了第二个恶兆,此即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到恐怖分子的严重袭击,造成伤亡人数逾万,毁坏财产更是逾百亿(美元)。此事件不仅令美国也令全世界震惊、愤慨,但也不乏有人幸灾乐祸、弹冠相庆。

在我看来,这两大恶兆都共同预示了新的世纪人类世界的某种特征或本征的现象。这种特征或本征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对此问题本书虽不敢说已经作出了全面的回答,但我认为,至少作出了非常关键的回答,即:西方哲学的确已经死了。

第一个恶兆,美国和北约扮演了人类上帝的角色,这无疑开启了一个极无信仰极不道德的可怕的先例。在这个先例中,不仅伤亡

①见《北京观察》,1999年第六期。

②见《方法》,1998年第二、三期(9)

③见《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七一八期。



自

序

了数万无辜的塞尔维亚平民，还连带杀害了更加无辜的三个中国人以及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大楼。关于后一点，美国人说是误会，真是误会吗？这只有让上帝去回答。

第二个恶兆，扮演了人类超越者的美国本身竟然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受到伤亡的依然是上百万无辜的平民。

这两个恶兆的共同点都是降灾于普通的平民。无论美国和北约的“正义”之师还是以“圣战”名义出现的恐怖分子，他们全都毫不例外地以伤害普通人的生命来显示其“正义”和“圣战”的威力。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究竟发生了什么毛病？

我认为，所有的毛病都源于西方哲学死了。而在西方哲学的死亡之前，它也早就杀死了上帝，摧毁了人类信仰和道德的根基，正如本书所言：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了道德真空的时代。造成道德真空时代的根源即在西方哲学的死亡。西方哲学死亡的含义即它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关心人类命运的智慧力量，相反的是，它损害人类自身的邪恶的力量反而倍增。在新的世纪，人类将吁求全新人学的诞生。

近代以来，处于西方文化中心论大黄伞盖之下的西方人一直豪迈地自称“理性的动物”，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说得非常正确。西方人的理性能力在近代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远较其他一切人类强大，正是因此，他们创造了全新的自然科学技术，创立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推动了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西方人强大的理性能力即得力于他们的哲学，得力于他们的充满了空前的逻辑力量的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即显示着西方人理性力量的产生和强大，人类的理性精神即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精神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全部，除了理性精神，人类还必须要有信仰的克己精神（意志）和仁爱的道德精神（情感）。依本文前论，人类理性精神、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是三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生发的人类精神的基元，在三者之间具有某种三联守恒的规律，即其中任何一者的过于旺盛或超越都势必导致其它



西方哲学死了

二者的衰退甚至亡逸。从深远的意义上看,信仰的精神往往倾向于利人类群体,仁爱的精神往往倾向于利他(她),而理性的精神则往往倾向于利己。所以,当主张理性的哲学愈来愈蜕变并强化为主宰一切的理性主义之时,人类的信仰和仁爱的道德便相应倒退甚至消亡。理性主义的过盛实质是利己主义的过盛。物极必反,人类过盛的利己主义事实上也愈来愈变得不再真正利己,甚至反而害己了。尤其当理性主义过于旺盛到消灭信仰、消灭道德之日,实际上也就是主张理性主义的哲学本身死亡之时。

从人类的历史看来,人类的大智慧曾诞生于古希伯来先知的神学、古希腊哲人的哲学和古中国圣人的人学。原初的神学、哲学、人学曾创造了东西方不同地区人类灿烂的古代文化,此外,在时间谱系上也展示了人类文化历史的大阶段。中世纪以来的新神学和新哲学在近代的一千多年中便已显然展示了人类历史中的两大阶段:封建神权社会和资本物权社会。在笔者的《问人性》一书中,这两个历史大阶段分别相应于官场化社会 and 市场化社会。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神学和哲学都已相继死去,唯一尚留给人类一丝希望的便是将诞生新的人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信息(知识)人权社会,这在笔者的《问人性》一书中相应于情场化社会。关于上述三种社会的历史分析和预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问人性》^①。

新世纪的人学将综合历史上的神学和哲学中一切有价值的关于人性的内容,以其全新的面目出现。为此,人类将不能不经历一场空前的人学逻辑思维的革命。关于这场新思维方法的革命,笔者看好东方,尤其看好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这是因为,古老的中国原本就是古代最初人学的故乡。

丧失了哲学的生命力的西方人,尤其美国人,其实仍旧有能力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有益的反思。中国古代圣人老子曾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真正的聪明人,真正的强者,是自知者、自胜者,而不必是知人者、胜人者。因为从来人们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是人们自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实也同样

^①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自

序

这样。中国圣人孔子又言：“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今天的美国人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却未必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当平均每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资源相当于3个日本人、6个墨西哥人、12个中国人、33个印度人、147个孟加拉人或422个埃塞俄比亚人之时，美国人原本可以少骄狂一些，少趾高气扬一些，可是偏偏美国人却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增加暴力输出的力量，一味只顾自身的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搞单边主义的一国独大；否决京都议定书、否决全面限制核试验、否决反导条约、强行推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以此掀起新一轮武器竞赛、拒绝参加反种族主义大会……等等。美国煞费苦心在世界上寻找新的敌人，却偏偏忘记了最大的敌人恰恰是其自身的圣哲之言。

我毫不怀疑当今美国的强大，甚至毫不怀疑它的武器力量足可以数次摧毁整个地球，但这又如何，美国人总不能用强大的暴力消除世人心中对它的怨恨。恐怖分子固然可恶，他们让平民流血；但动辄以强大的暴力威胁别人的霸道政治也同样可恶，他们同样让平民流血。我们应该反对一切让平民流血的反人道和反人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盛行恰恰是西方哲学已经死了的最显著的证明。

新的世纪全人类都将渴望具有新的充满人性的智慧，因此，全人类都将吁求充满这种新的人性智慧的新的人学的诞生。

黎 鸣

2003年9月22日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

- 1 第三大人学问题 (3)
- 2 20世纪留给人类的教训 (11)
- 3 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与理性主义 (14)
- 4 理性精神蜕变的历程 (35)
- 5 人类的精神是如何丧失的? (83)
- 6 21世纪,人类面临
 社会——自然生态双重总危机 (97)
- 7 21世纪:人类进入道德真空的时代 (102)
- 8 西方理性主义,前面是悬崖! (121)
- 9 复活人类的原精神 (124)
- 10 人类的新生之路——人类生命意义的革命 (134)

第二章 问题的解答

- 11 西方哲学死了——从神学、哲学到人学 (153)
- 12 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 (171)
- 13 20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179)

第三章 新世纪,对问题的回应与希望

- 14 21世纪人类的恶兆 (205)
- 15 为亨廷顿的书重新命名 (207)
- 16 这一千年从神到物到人的历史观 (212)
- 17 从人学反思两千年 (218)
- 18 从人学反思马克思 (225)
- 19 哥德尔、“深蓝”与21世纪人类对人学的吁求 (240)



西方哲学死了

- 20 从中西医结合问题谈及
新世纪人类思维方法的革命 (256)
- 21 人学逻辑革命,希望在我中华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 (304)
- 22 从人学的观点看人类
历史中的等级和等级制 (322)
- “思想狂徒”黎鸣(代跋) 苍 狼 (333)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

第三大人学问题

为什么人类社会愈是按照西方文化模式走向“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却愈是表现出冷酷无情，甚至残忍凶狠，这样的“进步”究竟要把全人类推向何处？

在近代人类的人文、历史、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提出过两个著名的人学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到人类的两个原精神，即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后者又可直称作科学精神。

涉及到人类信仰精神的著名问题是由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提出来的，因此又可称作马克斯·韦伯问题，或简称韦伯问题。这个问题即：

为什么人类中的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兴起于十六七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地区？换言之，即，人类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首先兴起于西方的天主教地区；当然也更没有首先兴起于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等其他世界性人类宗教传播的地区，这是为什么？

马克斯·韦伯专门撰写了几部书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当然首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此，他还兴起了称作“宗教社会学”的一门新的学科来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马克斯·韦伯的后半生基本上就专注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这从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共三卷)的写作和出版即可印证。

该文集的第一卷包括《序言》(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基督新教诸教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世界



马克斯·韦伯问题：为什么人类中的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兴起于十六七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地区？换言之，即，人类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首先兴起于西方的天主教地区；当然也更没有首先兴起于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等其他世界性人类宗教传播的地区，这是为什么？



西方哲学死了

人类的三大原精神——信仰精神、求知精神、仁爱精神，人类缺乏其中的任何一种都终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厄。

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其中包括《导论》(1915)，《儒教与道教》(1915)，《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1915)；第二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第三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古犹太教》(1917—1919)。^①此书总序写于1920年，韦伯也在这一年去世。可见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确实是至死不渝。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这是值得的。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到全人类的原精神之一——信仰精神。人类的三大原精神——信仰精神、求知精神、仁爱精神，人类缺乏其中的任何一种都终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厄。然而，现代人类正面临缺乏两大原精神——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其中尤其匮乏仁爱精神的巨大的困厄。人类当今的“现代化”正在以罕见的加速度摧毁人类自身的这两大原精神，这正是促使作者写作本书的最重要的动因之一。

围绕韦伯问题还可以有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的提法，以及连带的相应的问题。作为同一问题的不同的提法有：

为什么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兴起于近代西方人类的新教地区？作为连带的相应的问题则有：

为什么官场化社会首先成熟于东方(尤其中国)，并长期持续、停滞，难以从自身力量中获得新的创造性的(革命性的)进步？

韦伯问题的重要性，诚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是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的原精神之一的信仰精神问题。即是说，求解这一问题势必要求探讨人类原精神之一的信仰精神的本质及其最具体的历史形态，而这正是将兴起于二十一世纪的人学学科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韦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把他的探讨的触觉遍及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其结果，虽然不能说他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反对他的观点的人与赞成他的观点的人同样多，但的确应当肯定，他为后人的探讨作出了相当有益的铺垫工作，而且他的论点也确实触及到了信仰问题的本质。下面我们继续接着谈谈第二大著名的人学问题。

^①以上见《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7页。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

尼达姆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其中尤其是伟大的中国？

涉及人类求知精神(或直称科学精神)的著名人学问题是由英国著名生化学家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师约瑟夫·尼达姆(中文名李约瑟)(1900—1995)提出的,故又称尼达姆问题,或李约瑟问题。问题的提法如下:

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其中尤其是伟大的中国?

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类的原精神之一的求知精神的本质,同样这也是将兴起于二十一世纪的人学学科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与此问题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东方民族(其中特别是中华民族)缺乏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传统?或为什么真求知精神首先创发于西方的古希腊?

李约瑟在他的一篇发表于1964年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我终于开始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即: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①

这正是李约瑟提出第二大人学问题的原初的完整形式。李约瑟坚信,“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答案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结构。把中国和欧洲加以比较,对我们的研究尤其有帮助。”而且“我一开始就对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抱有深深的怀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从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位专门的中国科技史家,主持撰写了七大卷《中国科学技术史》(Sci)皇皇巨著。这部巨著的撰写和出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至今天李约瑟博士已经成为古人仍旧未能完全竣工。第一卷的《导论》

^①《贝尔纳纪念文集》,伦敦,1964年。